青岛日报
邮箱:cyy0532@163.com 2024年12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 崔 燕 李 魏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李 斌 排版 张春梅

我与《青岛日报》的故事

纪明涛

我与日报的情缘

在记忆长河中,《青岛日报》就像一位特殊的伙伴,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是良师亦是益友,互为灯塔,照亮彼此。

初遇《青岛日报》是24年前,我从大学选调分配到基层街道工作时。彼时,我在党政办公室工作,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各个部门和领导们分发报纸。每天清晨,我会早早在单位传达室等候报纸的到来。那一抹清新的油墨香,像是一把神秘的钥匙,打开了我对这座城市认知的新大门。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报头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像是有一种魔力,吸引着我迫不及待翻阅,汲取着信息能量与文化含量。

阳光洒在报纸上,伴随着油墨香的氤氲,我快速浏览一遍,如同探险家打开寻宝图一般。我把报纸折叠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每个科室和领导们的门口,双手沾满了黑黑的油墨。我没有丝毫嫌脏,反而觉得每份报纸都像是一支跳动的音符,奏响了每天工作的乐章。

后来遇到两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一件事是街道的一名领导对日报的态度。某日我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其办公桌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他过去一年看完的报纸,横平竖直,令人惊讶。他告诉我,报纸是大千世界的窗口,也是学习的加油站。报纸翻阅后,还可以给其他同事当“资料库”。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给我很多启示与感悟。小细节反映大格局,他做任何事情都严谨细致,此后能获得国家优秀公务员的荣誉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另一件事是我在组织系统工作时,有幸与《青岛日报》的两名记者讨论稿件。他们与我分享日常工作,为了一个独家报道,可能在深夜还蹲守在现场,只为获取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讲述在狂风暴雨中奔赴受灾地区,只为将现场群众的情况及时传达,让更多人伸出援手。虽然这两位记者谈笑风生、风轻云淡,但眼里却闪耀着对新闻事业热忱而坚定的光芒。他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故事像一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对新闻行业的理解,也让我对《青岛日报》背后的这群人肃然起敬。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岛日报》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我从事文字工作的历程中,从报纸上寻找素材成了必修课。于是,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潜移默化中养成了对文字,特别是对美文的偏爱。每天沉迷于阅读、写作,如醉如痴,尤其喜欢把那些直抵内心的文章剪下来收集着,再粘贴到一本本白纸装订的本子上,分门别类整理成册,或供写作时参考,或闲暇时翻看。这份精神食粮如甘泉般润泽着我的心田。美好的文字是可以赏心悦目的,与文字相逢的瞬间是一见钟情的欢喜,一路走来,收获良多。

时至今日,我仍然习惯剪报。我通常讲要用好“两把剪刀”,一把是“机械剪刀”,一把是“电脑剪刀”。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定期翻翻以前的剪报,如徜徉在文字的河流中回望,那些美文如佳茗、如美酒,沁人心脾,令人陶醉,一读再读,难以割舍,剪下来留存,让文字留痕,不仅能拥有一处怡情的乐园,更能温暖我的闲暇时光。

剪报的过程,仿佛在读一本量身定制的书。这些零散剪报,主题多样,风格迥异,篇幅短小,意蕴深厚,积少成多,成为提升自己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形成了一种“毛病”,成为一种癖好,而且越来越钟爱,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其实,剪报的过程如同一场与文字的约会,小心翼翼地裁剪,既是对知识的敬畏,也是对美好的珍视。回望我剪报的那段美好时光,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如同一朵永不凋零的花,持续散发着岁月的芬芳。

后来,在街道工作时,《青岛日报》又成为我在基层沃土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的好助手。每天清晨,我都会在办公室等待它的到来,那种期待如同期盼远方亲人的信件。我随着记者的笔触领略青岛海边的潮起潮落,感受崂山云雾的缥缈神奇;我为城市里那些温暖的好人好事而眼眶湿润,也为青岛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新突破而热血沸腾。每当我看到一些典型案例、先进经验、启迪文章,我都会在上面直接批示,让同事们学习和分享。从中我深刻地悟出,思想才是文字工作的闪光点。这种通过报纸举一反三的工作方法,让基层同事们的视野得到了拓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也养成了大家相互学习的好习惯。

当然,我自己也从《青岛日报》中受益匪浅、感触良多。那些精彩的报道、优美的文章,都是我以前学习写作的范本。我模仿着里面的写作手法,努力让文字也能有那样的感染力。因为它,我开始尝试向报社投稿。终于,我的文章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那一刻,我的心像是绽放的烟花,好像有一场音乐会正在我的身体里唱响。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自己的文章,那种成就感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不仅是我的文字被认可,更是我与《青岛日报》缘分的又一次升华。此后,每当我的文字出现在《青岛日报》上时,那感觉就像是与这位挚友共同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心中满是自豪与喜悦。

在岁月的流转中,我与《青岛日报》的缘分也愈发深厚。而今,我从一名忠实的读者成为报社的一名领导,深感重任在肩,任重道远。这些年,全媒体的迅猛崛起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对日报来说也是严峻挑战。“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75年沧桑岁月的深厚积淀,有一代代报业人孜孜不倦的耕耘,有一群志同道合不以山海为远的战友,我们会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在追风赶月的征途中,心怀职业的理想,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继续挺立时代潮头,为改革发声,为城市立传,为人民讴歌,续写更多新时代新征程新华章!

张 彤

云深不知处

我在青岛日报社工作了18年,先在晚报,后来又去早报,18年来的工作内容基本没换过,一直在做文化板块,有文化娱乐新闻也有副刊。时间过得快,现在说起来,我离开报社也已经8年了,人生没有几个8年,更没有几个18年,所以报社的同事约我写“我与《青岛日报》”时,感觉千丝万缕,理不出一条线来。

我从未在日报编辑部工作,虽然在同一栋楼里待了好多年,“日报”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既远又近的存在。在晚报时,凡是有些资历的同事多是从日报编辑部调来的。听他们偶尔说起上夜班、拣铅字、画大样这些词来,感觉十分神秘。我去报社工作时,早就告别了“铅与火”,所以,我在报社从未在稿纸上写过稿子,但说起来也奇怪,我对自己从未使用过的大样纸、铅字版有一种顽固的向往。可能是类似的文章看得太多的缘故,我总觉得那种手工状态更接近于想象中的“办报”。在我们的心目中,报纸是神圣的,铅字代表着某种权威,而如此神圣权威的东西,如果用手工一下一下打造出来,那该多神奇。

《青岛日报》已经创办75年,是一份有历史的报纸,青岛日报社也同样是一个有历史的单位。凡属历史悠久的单位大都有个特点:里面有许多高深莫测的人士,他们可能既非所谓专家,也不是领导,但见多识广,所以,我到报社门口时常会想起那句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举一个小例子。2016年9月,我即将到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报到,离职之前要把餐卡里的钱全部花掉、门禁消磁。报社是个大单位,人来人往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入职离职都不是什么稀奇事。我觉得,除了在早报编辑部和几个报纸的文化副刊部,估计也没有人会关注我换工作这件事。我去物业公司的财务部注销餐卡时,低头为我办理手续的大姐突然问我两个问题:Z老师退休了吗?H老师还在编辑刊物吗?她所提到的两位老师都是岛城的名作家,也是我即将报到的新单位的前辈,虽然我即将到新单位入职,但此时那里是个啥情况还糊里糊涂。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了几句,那大姐抬头看我说,行,我看你去那儿能行。我出了一脑门汗,不知如何接话,一边讪笑一边着急忙慌地走了,我不知道为何这位大姐对我的这点事如此了解。过了好几年我才从老同事那里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日报老一辈的副刊编辑,于岛城文坛那是一个“门儿清”。

回想起来,虽然我后来一直上夜班,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交流少,但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天天都呈现在新闻纸上,其实,很多人都是互相熟悉的。201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曲终人不见》,日报的“三味书屋”很快就选发了那本书的前言。后来专门为那本书做了一场音乐会,我去给王亚平和薛原两位老师送票,他们都表示看书就行了,音乐会还是留给喜欢的人去。从那本书开始,我渐渐地成为一名写作者。报社里的作家很多,他们也渐渐地以我为同道,我至今也时常与他们聚会,酒酣耳热之际,聊聊最近读了什么,写了什么,这是许多年来我在报社工作的日常状态。我至今记得一位同事讲过的一段话,他说人在给自己一个写作计划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段时间有归宿感。“归宿感”其实是一种难以获得的感受,我们天天劳碌,何尝想过心归何处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副刊编辑其实是在给许多写作者创造“归宿感”。在热闹的新闻单位,文艺副刊编辑多少有点特别,他们的工位上都摞着一叠书,匆忙走过,只见书不见人。日报副刊的许多编辑都是有影响的作家,想到他们,就觉得我从报纸记者走向专业写作似乎也是必然。

我第一次在《青岛日报》发表作品已是2017年末,当时是薛原兄约我写了一篇电影《芳华》的影评。我1998年开始作电影记者,写过不知道多少影评,但那都是职业行为。此时的这一篇影评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作者的写作,所以写得格外用力,记得也特别清楚。2022年,我又开始陆续给琴岛副刊投稿,发表了一些散文。我现在主要的精力是用来写小说和编期刊,但我一向认为,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的作者,都免不了有一些“外溢”的感受,适合写成三两千字的文章,甚至千字、数百字的短文,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一座城市也应该有集合本地作家的报纸副刊,传媒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活是否活跃,报纸副刊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网络写作兴起之前,写作者多从报纸副刊开始,许多成名已久的名作家,在面对报纸副刊时,也多不会吝惜他们的笔墨,因为那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对读者来说,这些短文方便阅读,对作者来说,写这样的文章,好比书法家写正楷,画家画素描,既能见到基本功,也能见到真性情。

我至今仍然保持着读报的习惯,只不过时常是在手机上读电子版。《青岛日报》的艺术青岛专刊以及青报读书、琴岛副刊更是每期必读。毋庸讳言,传媒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我仍然相信,有一些价值是恒定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王 漾

难以割舍的情感

《青岛日报》是“大报”。记得有位知名诗人曾说过,《青岛日报》在青岛就相当于《人民日报》。可见其影响和魅力。

我第一次与《青岛日报》有联系,还是在恢复高考的那年。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我所在的单位,约我去报社一趟。我这是第一次踏进报社的大门,心里不免还有些紧张。接待我的编辑是位中年女性,对人很客气,细声慢语。她问我参加高考了?我那年确实参加了高考,并被通知体检,就等院校录取了。我忘记当时报社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只记得女编辑说,那你一定有许多体会感受了,写一写,让更多的人知道好吗?我一听很激动。因为当时在《青岛日报》上出现名字,那可是几乎全市人都知道的大事。我满口答应,还特别问了一句:有什么要求吗?女编辑说,写你心里想的就可以了。

很遗憾,那篇约稿没见报,我那年也没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后来回想,虽然编辑让我写内心感受,但当时的我,深受过往时代末流的影响,还沉浸在“东风吹,战鼓擂”的小框框里,忽视了报社的大格局。

不过,与女编辑交谈时的鼓励、鞭策的话语,我却没曾忘记。来年,我终于踏进了大学校门。稿子虽没发在纸媒上,却印在了精神世界里。遗憾的是,我迄今不知道那位女编辑为何人。

1992年,我随青岛首个党政培训团赴新加坡培训,所见所闻令我感慨不已,于是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我看新加坡”,投给了《青岛日报》。我当时心里有些忐忑,篇幅太长是一方面,另外毕竟是国外感受,能发吗?没想,稿子一周后见报,仔细阅读了一遍发现,竟一字没删,还破天荒地配发了两幅照片。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报社的敏感、前瞻、胆略明显超出我的想象。后来得知,稿子见报,当时的市委书记看过后还专门给有关部门领导打电话表示肯定和鼓励。我还获知,那篇稿子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和感叹。一位同事跟我讲,他亲眼看到一位门卫拿着刊登那篇稿子的报纸对周边的人说,咱们要快发展啊,将来也要像新加坡一样富有。这让我对报社的领导、编辑们更加刮目相看、钦佩有加。

《青岛日报》是党报,自然更“与时俱进”,也更注重“思想引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青岛日报》开辟栏目,回顾4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那一年,我又写了一篇长文“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回顾了我市第一次向全社会公开选聘四名领导干部的点点滴滴。因为我曾是具体组织者,因此掌握一些细节和“内情”,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开过,甚至当事人也未必了解。稿子完成后,我担心编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便与报社的领导沟通。没想领导一听题材,马上表示支持并说,他当年也曾参与过选聘工作的报道,对我市在干部选拔上的重大突破感触颇深。

稿子发表后引起一定反响,让许多当年参与的人旧话重提,感慨万千。公开选聘虽然目标只有四个人,但报名参与的却有200多人,这些人后面是所在单位的同事以及亲朋好友,还有整个社会的关注。如此算下来,可以说是成千上万人介入了那次轰动整个社会的“变革”中。这是改革开放最有力也是最实际的证明,特别是最终被任命的四位领导干部,他们后来的进步历程,与那次公开选聘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没有那次公开选聘,就未必有他们后来的发展。而《青岛日报》不吝版面,让我的拙作刊登出来,足以说明他们对改革开放中所涌现出的“新鲜事物”,是何等的关注、支持。

《青岛日报》虽有不少“阳春白雪”大作,但又不乏“下里巴人”的稿件。我曾发表过许多稿件,多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不论是在街道办事处工作时写的邻里之间的琐事、小事,还是调机关后写的一些“社会现象”,无不透露着庸常百姓、普通人家的烟火之气,而这些稿件,报社并没因为“平淡”“寻常”拒之门外。这让我心生感激,也激发了写作的信心。几十年过去了,纸媒似乎有逐渐隐退之势,但我始终订阅《青岛日报》。没别的,那是一种情感,难以割舍。

张 毅

往返于生活与文学的堡垒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学习写作的。幸运的是,自己从开始就得到了《青岛日报》编辑们的鼓励和培育。

那时,我在胶济铁路沿线工作,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并开始在《山东文学》发表诗歌。我在《青岛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诗。稿子是从邮局寄到报社的,编辑老师看过后回信说,您发来的诗歌收到了,语言很美,准备刊用。接到信后,自己高兴了很多天。因为能得到《青岛日报》编辑的认可,对初学写作的自己是个巨大鼓励。从那时起,我陆续得到了刘海军、王亚平等诸位老师的鼓励。

我的文学缘起恰好与改革开放的时间重叠,中国文学也迎来自己的繁盛期。那时,许多诗人开始进入新散文写作,使散文呈现出一种深邃大气的艺术境界,也让我感受到散文的强大引力,从那时起我写了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后来收入我《迁徙的鸟》的散文集。这本散文集里的大部分作品是在《青岛日报》发表的。

这些年,我陆续在《青岛日报》发表过许多散文,有的被《散文选刊》选用,有的进入年度选刊和年度散文排行榜。其中《北风》先是被《散文选刊》选用,又被林贤治先生选编的《2003:文学中国》选入,后再次入选他编辑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书;《梦中的马》进入2005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大雨将至》被推为“近年国内杂志所发印象中的好散文;”《蟋蟀在黑夜吟唱》、《滨海读思》、《迁徙的鸟》三篇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散文》。

在这些散文里,有的还被青岛电视台拍成电视散文,分别是《家族的记忆》和《开往城市的火车》。其中《开往春天的火车》被评为“中国名家散文系列电视散文”,是根据我的散文《开往城市的火车》拍摄的。在这篇散文里,我从自己与父亲两代人的角度,书写了胶济铁路对于青岛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反映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并获得过电视领域的多个奖项和好评。

在创作的同时,我多次参与过《青岛日报》的征文活动,其中,2009年在《青岛日报》副刊组织的一次征文活动中,我创作的组诗获得一等奖。

在长期的写作中,我注重用悲悯的眼光,关注人与动物的生存困境,以冷静的笔调和诗意的语言,描述生命在生死消亡过程中的灿烂和悲壮。我在散文里写过故乡:黑夜来临之前,鲁庄上空飘着一层薄雾,久久不散。喊牛的声音、找孩子的声音、农具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地缭绕在村庄四周(黑夜的记忆);我写过亲人:祖父就在这样的灯光下喝酒。老人晚年唯一的嗜好是喝一种地瓜酿造的老白酒,然后在夜里使劲地咳嗽,有着吐不尽的岁月沧桑(北风);写过因为政治事件被迫离开故园,最后客死他乡的三姑;写过那辆载着父亲和自己梦想的火车(开往城市的火车)。我写过许多动物:食草动物在食肉动物面前奔跑;动物在人类面前奔跑;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逃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面还有一只大花猫。生活的逻辑就是这么现实而荒谬。在《古老的牛群》里,那头一生劳作的牛,最后却被宰杀了;在《梦中的马》里,那匹逃离了农耕的马,在一个大雪之夜回到自己主人的院子。在《迁徙的鸟》里我写道:那个秋天,鸟的出现似乎没有迹象,但它们确实出现了:三只、五只或者更多——这是一些迁徙的鸟。它们用夜色隐蔽自己,尖厉的鸣叫蕴涵命运的成分……鸟是有灵性的,鸟在人类生活中不停地鸣叫着,这是鸟类的生命之歌,是一首穿越时空的生命乐章。

这些年除在《青岛日报》发表作品外,我还在几十家国内有影响力的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多篇。小说、散文多次被转载。在1991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青春的风》诗歌征文评奖中,我的诗歌《歌唱腰鼓》从全国2万多份来稿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唯一的一等奖。

能获得这些成绩,离不开《青岛日报》编辑的认可和支持。作为一个写作者,只有感恩鼓励,并与《青岛日报》相知相守,携手共进。

高 伟

太平路33号,我永远的精神地址

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招考公务员。我考上了。

那是1982年,我高考落榜,就参加了这样的公务员考试。我考上了,去了市南税务局工作。那年我18岁。第二年就参加了电视大学的学习。学习很繁忙,半脱产,业余时间全得用上。我22岁毕业了,当天,我就拿起笔来写诗。虽然那时诗是什么,人生是什么,爱情是什么,我一窍不通。我还是写这些我不懂的事物,因为我喜欢诗。为什么喜欢诗?我也不懂,我想我的灵魂天生是一颗语言的种子,在语言中我最爱的就是诗。毕业了,业余时间全是我的了,可以读诗写诗了。我写的第一首诗就是《致友人》。

那时,我的单位在湖南路上,青岛日报社是太平路33号,两个单位仅隔了一条街。20世纪80年代,青岛日报社还是一个小楼,在栈桥边,白色的楼体,楼体不高,红的瓦像个小红帽。对我来说,青岛日报社是极其神圣的地址,每一回走过它,我都会想起张爱玲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满山遍野都是今天。”这话是张爱玲说给胡兰成的,说这话的时候他俩正相爱着。不知怎的,这句话成为我心中青岛日报社的隐喻,每一回走近它,走过它,它散发出来的金沙金粉的光芒总会打在我的脸上。我最喜欢《青岛日报》的副刊,日报每天四个版,每周一个副刊版面。副刊上面发的文章和诗歌,它们太棒了。平时显得挺平凡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印制在报纸上,每个字都变得尊贵,有思想,沉甸甸的,金灿灿的。那时,我的人生理想就是让自己的文字在《青岛日报》上变成铅字。

我把《致友人》手抄在白纸绿格的稿纸上,放在单位的信封里。青岛日报社近在咫尺,我也没敢送过去。我买回邮票,认真地贴在信封的右角上,去了邮局把它投寄出去。这样做才对得起我心中《青岛日报》的圣洁。然后,我就忘了这件事。打死我我也没有胆量认为自己的第一首小破诗就能变成铅字!

一个月后,我在单位里接到了一封来自青岛日报社的信。信封在我手里时,我都惊吓得不敢打开它来。是一个叫李洁的编辑写给我的,她让我去青岛日报社“一晤”。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青岛日报社,李洁老师原来是个男的,瘦,白,特别年轻。李洁也没有想到“高伟”在他眼里由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小姑娘。我后来知道,李洁觉得我那首诗不错,想发表,但就怕这首诗是抄来的,他想见一下作者,聊一聊,就能看出是不是抄袭的文字。

有一天,我和我的同事董文波约好了早晨起来去海边逛逛。那天,我们聊三毛,三毛的小说把我和董文波震得一愣一愣的。我们聊着聊着走到了栈桥边一个报摊前。摊开的《青岛日报》上有一首诗,竟然是《致友人》,我拿手把眼睛擦了一下,怕这是我出现的幻觉。再一看,确实是我的那首小诗,我的名字要人命地印制在上面呐。我发表诗歌了!我狂喜。董文波用艳羡的目光看着我,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目光。那一天是1986年11月11日。

那一天,我把这张报纸一直攥在手里,晚上睡觉时把它放在枕边,醒来了几次,看看它还在,才觉得这不是梦。

然后,我就在《青岛日报》开始发起了稿子。须知,当时在《青岛日报》发一篇稿子不是一件小事,全市那么多热爱写作的人,一周只有一个文艺副刊版面,而且,那时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想在《青岛日报》副刊上发表作品,在这里发几篇作品,就会被几乎所有的热爱文学的人知道,太不可思议了。

1988年,国内影响力最大的《诗歌报》公开发出征稿启事,主办首届探索诗大奖赛和爱情诗大奖赛。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全国诗歌大奖赛的先河举措。李洁给我打电话,让我参与。我参与了,而且得了三等奖。当时的获奖消息刊登在1988年7月9日的《青岛日报》上,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城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得到的鼓励是无与伦比的,我爱诗歌,诗歌以它的温暖回报我。文字鼓励我成长,大过世间的一切。

1990年,青岛日报社举办北九水笔会,我有幸参与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笔会,和一众这个城市优秀的文友共同游历美丽的北九水,还有山水中的沟通与畅谈,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我写了随笔《山魂》,发表在1990年8月28日的《青岛日报》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随笔。这篇随笔的责任编辑是徐昆源。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徐昆源与我几年后竟然成为前后桌的同事。

1991年,我从税务局调到《青岛晚报》副刊部,成为一名光荣的副刊编辑,副刊部主任就是李洁。

从此,我一手写诗歌,一手写随笔,诗歌和随笔集陆续出了20本。直到今天,每一天,我都读诗,写字。人呵,其实最大的幸运,就是一生干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我就是有了这样无上幸运的极少数人之一。我说过,如果有来世,上苍再许我当一个书生,我就来;不许我当书生,我就不来了。

我的人生有两次极端重要的决定:一次就是我从事报业工作,每天看栈桥和大海;一次就是前几年把房子调至老市区,可以看栈桥和大海。太平路33号,我永远的精神地址,我一扭头就能看到它。大海,我爱它爱得生疼,如果我说我爱青岛的大海第二名,那么谁也别争第一。

从此,我和这个城市最有智慧和最有趣的人成为同事。和这些有能力的人在一起,我,从来不敢懈怠,我必须成长。这些当年的领导、老师和同事,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这是个优异的集体,我一想起来就温暖,心动。